生态文明的前瞻

在茫茫的宇宙中，地球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的星体。在悠远的时间长河中，地球上的生命采取过多种形式，也曾有过高出目前许多倍的物种在一个时期内生存和繁荣，然后又因地球条件的变化而灭绝、消失。优胜劣汰，新陈交替，人类就是在如此不断演变过程中出现的。

大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则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扬起了文明的风帆，驶向历史的长河，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劳动、生息、繁衍的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文明，是指反映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总和、标志人类社会开化状态与进步状态的范畴。换言之，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进步、合理成分的积淀，文明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发展变化。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发展，其最终指向都在于追求人类社会的更高级的生存方式，实现更高层次的文明状态。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已相继经历了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

人类社会自摆脱蒙昧状态以后，最先确立起来的是以个体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血缘关系及个体人际交往为纽带加以维系的农业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最初的生存方式，农业文明产生并存在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农业社会，以农耕牧渔的手工生产为基本特征。农业文明展现出的那种“天人合一”，田园牧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式的理想追求完全建立在“靠天吃饭”的基础之上，人们对于自然乃至于人类自身都缺乏必要的了解，表现出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由此决定，农业文明只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被动性的自在文明状态。

近代工业文明肇始于工业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因而以工业化大生产为其基本特征。工业文明立足于人类的创造力和人类自身的生存需求，以人类征服自然为基本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人定胜天的价值取向驱动之下，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铸造起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工业文明是人类摆脱自在状态，开始步入自主自为发展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现代化即是工业化。

文明的发展遵循着交替更迭的规律。文明一旦陈旧、腐朽、衰落，它就要被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新文明无情地淘汰和取代。人类脱离动物界，就是文明的发端。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人类创造了古代的农业文明，为后代子孙留下了生息、繁衍的绿洲。然而，这块绿洲终因满足不了人类的物质欲求，在持续发展了几千年之后被机声隆隆的工业文明所取代。工业文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但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是巨大的。过度的工业化不仅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使人类自身的社会环境受到了伤害和冲击。这种异化现象的产生，深刻暴露出了以工业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模式与人类的环境要求之间的矛盾，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尖锐地提交给了全人类。辉煌了三百年之久的工业文明终于发现，大自然已经发出沉重的叹息，她已经伤痕累累，无力可支，再也无力养育多子多孙的人类。摆脱了物质极度匮乏的人类将以何种姿态迎接未来呢？人类文明怎样才能永久地持续发展下去呢？这是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后现代问题。

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底蕴而言，超越现代恰恰是现代化的本

质特征。工业化的发展铸造了现代工业文明，同时也在呼唤着新的社会文明形态。深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必将导致人类价值取向的再度深刻转换，促使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超越工业文明，指向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未来的文明将以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中心，实现人与自然的同步发展。相比较而言，生态文明将是一种互动性的自觉文明形态。

从农业文明经工业文明而生态文明，这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生态文明，概括地说，就是指用文明的态度去对待自然界，努力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认真保护和积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它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在价值观念上，要以真理为尺度，使人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念，增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识，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自觉地提高对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的要求与满足，既不应是无限的，也不能是无条件的，改造自然要具有合目的性的特点，要以不损害自然生态的整体稳定和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存为条件。

在生产方式上，要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使人类生产劳动沿着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使之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走上与生物圈协调互补的新轨道。以开发绿色产品为目标，发展无废料、少废料、封闭循环的生产技术工艺，对生产出来的废料尽可能地实行充分的环境利用。人类要在生产过程中采用生态保护的技术手段，使生态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使生态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在生活方式上，人们的追求应不再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生活。个体的生活既不能损害物种或群体的自然环境，也不应损害其他物

种的繁衍生存。要使绿色消费成为人类生活的新目标，使人过上真正的全面符合人类及社会道德的生活。人类生活不仅应是富足的，还应当是自然的。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和深入全面的贯彻，是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一个标志。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认为“发展”就是“增长”，“增长”就是“发展”。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下，人们把全部的热情和注意力都倾注于产量的增长，产值的增长和利润的增长上。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但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却是自然资源的衰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本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在人类社会面临全球性问题和发展困境的现实条件下，人们全面反省传统发展观，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出路，谋求新的发展战略，选择新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思想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子孙后代的发展能力；既要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又要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良好，从而做到环境与经济社会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前进，有序发展。可持续发展一是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二是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三是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只要社会在每一个时间段内都能保持资源、经济、社会同环境的协调，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就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实现了由征服、驾驭自然向与其共生并存的转变。从人对自然的征服、驾驭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是当代发展观所实现的重要历史性转折。在人与人关系的转变上，开始了由对抗斗争向对话与合作的过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交通、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大趋势下，国际形势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如何使社会既避免因激烈竞争带来的两极分化又能保持高效的运转，如

何使社会在和谐稳定的状态下持续发展，成为当代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人类文明进程发展到从价值观念到生产方式，从科学技术到文化教育，从制度管理到日常行为都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候，就标志着文明形态开始发生转变，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就是生态文明已露出曙光，需要人类共同努力，才能变成万道霞光的时代。本书的写作也就在于从考察人与自然作用方式转变和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中，透视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预示人类社会的文明状态必将超越工业文明，指向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协调的生态文明。

任何一个社会的既成文明状态都不仅是该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同时也预示着该社会未来发展的定位和趋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令世人惊诧的速度走上了现代化即工业化的道路。然而，当我们终于冲破了传统农业文明的羁绊，开始步入工业文明之时，先期实现工业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向世人展示工业社会创造的无与伦比的物质成就的同时，却暴露出了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及消极意义。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教训，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警世意义。显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面对因工业化而造成的环境问题的困扰，而环境的恶化又必然妨碍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一个二难抉择。

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两难矛盾。就现代而言，落后国家在发展形式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不等于在内容上已经解决了发展的难题和矛盾。我们所面临的是，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后现代的问题又逼到面前。面对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矛盾状态，我们需要明智地选择发展道路。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抉择，这一抉择，既是全球的大趋势，又是国情的要求，更是我国现代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内在要求。如果中国不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那么对发展的制约将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表现在不可持续人口发展基础上的资源制约。中国是一个相对的“资源贫困”国，人均拥有的各类资源大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1/3，而如果不控制人口或不继续控制人口，人均拥有的资源量将更为短缺，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无疑将构成“瓶颈”制约。其次，建立在不可持续人口发展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本身也将受到羁绊。作为生产者的过多人口将形成庞大的社会就业压力，而作为消费者的过多人口又将消耗大部分发展的成果。不仅如此，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等，都将被膨胀的人口所销蚀。最后，目前已经十分严峻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问题将愈益严峻。森林不断减少，沙漠化加速蔓延，水土流失日趋严重，空气质量不断下降，水资源短缺而水质下降，固体废物得不到有效处理等等。总有一天，生态破坏到了生态环境系统的临界点而发出崩溃的信号，那时，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中华文明的延续问题就可能是个现实的问题了。

现代化的实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亟 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这就需要我们理智地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道路，避免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弊端，朝着生态文明方向推进现代化进程。惟其如此，21 世纪的中国才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

令人振奋的是，中国政府现在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强调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协调发展，并且把生态建设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使我们看到，朝着生态文明方向推进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正在一条科学、理性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我们深信，21世纪的中国必将使黄土高坡、戈壁沙漠变成锦绣中华的一片绿洲，中华文明将再度放射出她耀眼的辉煌。

前工业文明的发展轨迹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才出现的，距今不过5000多年的历史。人类进入文明是从原始社会转变为奴隶社会开始的，但文明的孕育和萌芽早在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就已经发生。东西方的古代文明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特征，以农为本、耕织结合、自给自足，闭塞性与分散性突出。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人类活动受自然的严重制约，因此发展缓慢。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处于人类进化的前列，而且对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从总体上说，前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虽然有矛盾，但不是处于过分的激烈冲突中，社会发展进程相对缓慢。

一、前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关系

人类史已有300多万年，人类的远古时代是蒙昧和野蛮的。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石器是人类最古老的工具。时间跨度达上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采集、狩猎社会阶段，它虽然是人类的前文明时代，但人类文明却从这里起源。

远古时代，人类面临寒冷、饥饿、野兽、疾病和死亡的威

胁，生活十分艰辛。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人类成群地生活在一起，凭借简单的石器和木棒，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原始人群聚集在一个地区，辟山洞为居室，靠采摘植物的果实，捕捉野兽、鸟禽、鱼鳖，得到自己生存所需要的食物。

在人类历史上的采集狩猎阶段，人仅仅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成员和食物链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环节，人的生存状态和其他生物物种没有什么重大区别，其生存和发展完全由生态系统的内在法则支配。在这一时期，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和工艺是不存在的，生存资源只限于自然产品，人们对自身赖以生存的食物的生产过程不加任何干预，产品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也是自然生态系统完全能够同化的东西。人的消费水平仅仅限于维持最低水平的食物消费以延续生命和繁衍后代，人口规模也被严格地限定在天然食物供给量确定的限度之内。

采集狩猎社会中的人除了具有生存个体和群体的一般规律外，在组织上也有自己突出的特点。为了在掌握原始工具的条件下，适应相对严酷的环境，狩猎采集一般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形成亲族群体，而这种群体往往是小规模的，并且在不断地流动，因为每一个地方所能提供的食物是有限的。原始工具所能影响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在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合作，共同为生存而与自然抗争，这种合作不仅表现在社会活动上，也表现在一些简单的分工协作和对食物及其他物品的共享等方面。

在采集狩猎阶段，人类使用的是简单的石器工具，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人类的全部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基本建立在依赖于周围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最初，采集是可以维持生命的惟一手段，火的使用和渔猎的出现，使人类开始走上

征服自然的旅途。

但是，即使这样低水平的劳动，也带来许多问题。例如，过度的采集和狩猎，往往消灭了居住地的许多物种，人们在取得食物的同时，破坏了自己的食物来源，失去进一步获得食物的可能性，甚至造成食物链环的缺损，使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有许多大型哺乳动物，如猛犸象、披毛犀等就是这样灭绝的。这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最早的环境问题，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最早产生的人与自然的矛盾。

为了解决生存危机，古人群便进行迁徙，转移到有食物的地方去。但是，过一个时期，又以同样的方式破坏了那里的食物来源，又会被迫进行迁徙。那时，地球上人口数量很少，一个地区停止人类活动之后，生命维持系统可以慢慢地自行恢复，因而古人群总是可以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这样，人类采集、狩猎、迁徙的生活得以维持 200 多万年。

但是，迁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与自然的上述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需要选择新的生存方式，引进一个新的技术过程，这便是 1 万多年前原始农业产生的原因。原始农业出现在距今大约 1 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原始农业社会阶段。

原始农业最初仅仅是对自然的模仿。所谓耕作或种植，不过是将种子撒在地里，任其自然生长，等到成熟时节再来收取果实而已。这一阶段的农业生产只有播种和收获两个环节。以后人们发明了先放火烧荒，然后再播种的“火耕”方法。紧接着人们发明了先用石斧等工具将树砍倒，待其晒干，再放火烧荒的“刀耕火种”方法。后来原始人又发明了整地技术，这就是农史上的“耜耕农业”。

在原始农业社会，人们在生活和生产中使用的自然资源都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而且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极为简

陋，因而人们对资源的使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空间范围上都很有限，对自然系统的影响很难超过其承载限度。以刀耕火种为主的耕作技术和以石刀、石铲、木耒等为主的生产工具，既不会对自然系统造成大的干扰，也不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自然系统无法同化的废物。因此，原始农业社会人类活动受控于自然，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本身并不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系统的失衡，实际上是人屈服于自然。

由于作为食物生产者，人类获得了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因而使人们改变了作为食物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农业的发展使人口有所增加。原始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是氏族公社。每个氏族公社都有自己的领地，在领地内有人们居住和生活的村庄，还有耕种的土地、放牧的草地和砍柴的林地。每个氏族公社的全体成员都准备随时用他们的生命捍卫自己的领地，当然也准备着用武力去夺取别人的领地。氏族公社内部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土地归全体氏族成员所有，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参加生产和渔猎活动，产品平均分配。

原始农业的产生缓和了原始采集业后期所出现的人与自然矛盾。农业通过种植植物和驯养繁殖动物，把自然生态系统中难以被人类直接利用的无机物变为有机物，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储藏能，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能力。人们不再花费巨大代价去获取野生动、植物谋生，而只要耕种少量土地就能满足需要。

二、日出东方的农业文明

人类对自然系统大规模的改造始于传统农业社会。随着传统农业的出现，人类开始利用农业技术，开发农业资源，因此，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变化了，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和

人口规模急剧扩大。人类活动第一次成为一种不可轻视的重要的地貌营力，人类社会系统也跟着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传统农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从原始农业社会阶段进入到传统农业社会阶段，从前文明时代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

传统农业解决了古人群的生存危机，使人类从野蛮时代发展到文明时代。传统农业与原始农业的根本区别是传统农业中单位土地上的能量投入和由此带来的单位土地上的产量均有大幅度提高，而且传统农业既种地，又养地。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生活和生产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生物能源，特别是植物燃烧提供的热能是最主要的饮食和采暖能源，使用的资源主要是气候资源、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社会产品主要是人类衣、食、住、行的必需品，大多是初级产品，至多经过初级的手工加工；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也都是自然系统可降解、可同化的。因此，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对自然来说，依然处于被动地位，其技术结构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就资源与环境而言，可以说是和谐的，它本身与自然系统没有必然的冲突。但也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最直接的问题是土地不合理使用造成的土壤侵蚀和土地退化，社会承灾抗灾能力低下，人类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等等。

农业创造了人类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是著名的农业文明。

（一）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

公元前 5000 年，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然后传播到华北平原和沿海地区，约公元前 5 世纪传播到长江流域、东北和全中国。古代中国文明最早主要成长于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大多是平原，山地不多，西部是现在的关中平原。整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中平原土质疏松肥沃，十分易于耕种和农作物的生长。那时的关中平原，除了耕地之外，还有十分丰富的植被。太行山以东、河济之间的中原地区平原广漠，间有丘陵。当时这一地区黄土淤泥，土质肥沃，结构疏松，很容易开垦。在这个区域内，除黄河水系外，北面有海河水系，南面有部分淮河水系，并有不少沼泽、湖泊。

从地理位置来看，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西、南三面均有崇山或大川构成巨大的地理屏障。在人类文明成长的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落后，这一地区与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上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非常有利于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考古发掘证明，到原始社会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人们仍从事渔猎和采集，但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占了首要地位。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的生活资料，不同的自然条件决定着不同的农耕起源的过程。

地理环境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影响，首先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农业生产方面。古代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且不乏雨水，土壤肥沃，结构疏松，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因而农作物种植面积广大，品种也很多，粮食作物一向以“五谷”总归其名。一般来说，当时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有黍、稷、麦、菽、稻等种类。中国先秦时期最主要的两种经济作物是养蚕所用之桑和纺织所用之麻。

此外，黄河中下游地区还蕴藏着丰富的铜、铁等矿，为我国古代金属冶炼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其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人民已

经制造出红铜器。从历代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和商代冶铜遗址的挖掘中都可以看到，殷商时期，我国冶铸青铜的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由于冶铁比炼铜需要更复杂的技术和更完善的设备，我国的冶铁业在春秋中期以前发展得相当缓慢，产量少，质量也不高。春秋中期之后，冶铁业发展加快，到春秋末战国初，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古代中国文明成长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营农业的自然条件优越，粮食生产可以基本满足人口消费的需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靠“男耕女织”解决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绝对的支配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商业的意义，商业的发展缺乏有力的刺激。春秋中期以后及整个战国时代，商业有相当的发展，但也并没有改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状况。所以总的说来，古代中国文明中的商业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远不如古希腊那样重要，因而远不如古希腊那样发达。

发达的农业，是中国自周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主要条件，中国文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结构，都是围绕农业，在农业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而中国古代的文明主体，其骨干和主要成分，也是农民。这样，古代的中国文明，就带上鲜明的农业色彩。治水、用水、耕作技术、历算、天文、土地测量、饲养家畜禽、制陶烧瓷、冶炼等等，都是服务于农业的。生产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农业的生产力，而农业又是手工劳动。中国先进的古代农业文明是一种农业与家庭副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农制，精耕细作，灌溉技术先进，农业的生产率在前工业文明时期相当高，但仍是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可以说中国古代已将农业的手工生产发展到了极限，这是其文明发达的原因，其价值观、思想和道德也是围绕农业的，包括语言文字和艺术都与农业密切相关。

在传统的中国人的世界中，天地也即自然界，是强大的，至高无上的。人们要尊重它，顺应它。《黄帝内经·灵枢·逆顺肥瘦篇》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只有"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才能"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①] 如果人们的活动不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是任意地干预自然，违反自然，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礼记》中说："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秀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②] 意思是说，春正月实行夏季的政令，雨水就不会适时降临，草和树木就会早凋落，国家不时会有恐惧的事情发生。实行秋季的政令，人民就会有疫病大流行，狂风暴雨就会一起到来，藜秀蓬蒿等各种杂草就会一起疯长。实行冬季的政令，就会有水涝败坏农田，并将有雪霜造成大伤害，致使早春作物不能播种。

传统农学认为，作物本身是气，作物主要感受环境中气的阴阳状况而生长发育。而环境中的阴阳状况主要是由于日月的运动所决定的。《农说》中写道："冬至之后，阳渐长。立春，阳之出也。春分，阳气之中也。立夏得阳三之二，至夏至而极矣。夏至——阴生，夏至之后，阴渐长。立秋，阴之出也。秋分，阴气之中也。立冬得阴三之二，至冬至而极矣。"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由于太阳照射时间长短的不同，导致地球上阴阳的不同状况，从而影响到作物的生长发育。《管子》说："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

① 赵守正撰：《管子通解》下册，第 181 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年

② 杨天宇撰：《礼记译注》，第 24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① 与由于日月运动所导致的四季变化相对应，作物生长发育表现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命周期。只要顺应天地阴阳的变化，从事耕耘收藏的活动，农业生产就必然丰收；并且只有顺应天地阴阳的变化，从事生产，农业才能够丰收。而如果违背天地阴阳的变化，则必然是事倍功半，甚或劳而无获。

在农业生产中，古代中国人民主张严格地顺应自然，反对盲目地干预自然。认为违反自然的本性，人为地摄取天地的精华，操纵自然界的阴阳变化，干预自然，将会导致云气还没有聚在一起就下雨，草木不等叶黄就凋落，日月之光越来越不正常的后果。这体现出中国传统农学顺应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

（二）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大都在农业中集中地体现出来。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人们必须根据自然的法则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农业不仅决定了古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决定了古代的思想风貌，其基调就是天人合一。人道与天道合一的观念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物质生活依据的。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最高的人生境界。从历史和逻辑的起点看，天人合一首先是指自然界与人的合一。自古不变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本特质。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哲学中一个根本问题，用古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所谓“天人之际”。关于天人观，中国哲学中基本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为天人合一，二为天人交相胜。

①赵守正撰：《管子通解》下册，第 265 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年。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孟子“知性则知天”的学说，肯定人性与天道是统一的。董仲舒宣扬所谓“副天数”，“天人相关”，是天人合一的粗陋形式。到宋代，在张载、程颢、程颐的哲学中，天人合一才获得了比较明确的理论意义。张载、二程的天人合一思想，分析起来，包括这样几个命题：

(1)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张载说：“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① 明确肯定人是一物。张载《西铭》说，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其主要意义在于肯定人类是天地即自然的产物。

(2) 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这普遍规律。张载在《正蒙·参两篇》说：“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氤氲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谓之何哉？”② 阴阳相互作用相互推移的规律就是性命之理，自然界与人类遵循同一规律。

(3) 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张载说：“性与天道云者，易而已矣。”③ 他认为性与天道具有同一内容，就是变易。程颐说：“道与性一也。”④ 又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⑤ 他认为天道、地道、人道具有同一性，其内容即是理，也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张程都肯定性与天道的同一性，但张载以为这道即是变易，程颐则以为道即是理。

① 《张载集·语录》，第 313 页，中华书局 1978 年。

② 《张载集》，第 12 页，中华书局 1978年。

③ 同上书，第 10页。

④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二程外书》第 25 卷，第 24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

⑤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二程外书》第 22 卷上，第 21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

这是彼此不同的地方。

（4）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协调与和谐。这是《易传》提出的，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为理想境界。张载、程颐也接受这种观点，但是没有更详尽的发挥。

应该承认，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谓“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视天地人为一体，强调和追求天地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和谐性，承认人与天地万物具有不可分割的意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天人合一的命题是基本正确的，它对当代生态哲学价值论的确立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启迪意义。但是，对“天人合一”还有其他神秘主义的理解，诸如把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等等，这是不可取的。

中国哲学中另一种天人观就是天人交相胜的观点。荀子强调“明于天人之分”，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也具有深刻的意义。但其影响远不如“天人合一”的理论。

荀子宣称：“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至人即最高的人格，最高的人格是懂得天人之分的。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著名命题，认为自然界有其客观的必然规律，与人间的治乱祸福并无联系。天与人各有自己的功能，“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改造自然的主张，在中国哲学史上呈现出独特的光彩。

唐代诗人、思想家刘禹锡写《天论》一书，深入论述天人关系。刘禹锡对“天人交相胜”观点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